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与理性思考^{*}

韩美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和现实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反思近代中国上百年的文化发展道路,要尽快改变我国在文化建设上“西强我弱”的状况,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固守原来的作法,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从理性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也是遵循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按照文化发展逻辑不断开辟和创建出来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历史;现实;理性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3)01-0038-06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的总体目标和战略方向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新的概念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主题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既不是某个领导人的即兴发挥,也不是学者们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深刻总结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2],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要尽快改变我国在文化建设上“西强我弱”的状况,使经济和文化能够协调发展,就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固守原来的作法。这是从总结和反思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一)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体”“用”之争

* [收稿日期]2012-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KS010)“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中的文化选择与创新研究”;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点项目(2012001)“当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韩美群(1975—),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仁人志士就在艰难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为了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维新派人士主张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而在文化上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种“中体西用”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中国“道统”“纲纪”“伦常”是能变的,而西方的“器用文明”包括某些体制则是可以借鉴的。这种观点相对于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顽固守旧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保守的。当时的改良派人士梁启超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都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尔后,现代新儒家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但是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中本身包含有开出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因此,向西方学习不是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添加到中国文化中去,而是通过学习和吸纳西方先进文化,从中国文化里面发展出现代的东西。这种观点正确地看到了文化发展中坚持“以我为主”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看到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必须以批判改造传统文化为基础和前提,但是,它过高估计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认为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新儒家的这种观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一些学者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其所说的“体”主要是指生产和生活中的“器用”之体,而对于政治制度,则主张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并实行“转换性的创造”。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西化论”,但又渗透了某些保守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如其所言就是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的一种“再说”。除此之外,我国另外一些学人们还提出“互为体用”论,认为以谁为“体”谁为“用”,都要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出发,而不能将其定型化和机械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任何文化相对于一定的环境条件来说,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或适应和不适应

之处。因此,对于中、西文化,应该根据具体条件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以上这些观点,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已经证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论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的错误(“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和“用”的关系,导致理论上不彻底;“全盘西化”在理论上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至于“西体中用”论,虽然在阐释上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在本质上仍旧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现代新儒家“中国文化本位”论虽然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和前提作用,确立了在文化变革中“以我为主”的主体作用,但是,它的所谓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观点,还是人为地夸大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互为体用”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却回避了中西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的主次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中国仁人志士们经过近一个世纪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及其历史实践最终证明,所谓“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二)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早期思考与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的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这种新历史观基础上的文化思想。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者也为此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开始投入到这种宣传中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表的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著,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对中国文化的性质、任务、特点、道路、方向和前途都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在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的基本观点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的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新民

主义的文化,它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文化建设的根本路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社会文化现象,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工农大众及其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新文化。

实践证明,在20世纪上半叶纷纭复杂的文化论争中,各种文化流派都在理论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但是,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其他文化流派都只是上阵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了。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对于文化的唯物辩证的分析,确实比其他文化流派的观点来得高明和深刻,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农群众的认可和接受,其影响越来越大。

(三)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与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曲折而艰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了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建设具有高度文化的先进文明国家的目标。当时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在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让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等。但是,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和发展,正常的文化建设遭到扭曲,文化和教育领域成了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和重灾区。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遭到空前破坏,在文化领域,“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是最为严重的。但是,把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理论说成一团漆黑也是片面的。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发展的思想,关于实现科技现代化和建设高度文化国家的思想,关于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对于如何突破苏联既有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所作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文化改革和发展都

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属于文化发展道路曲折探索的三十年。我们曾依靠革命的激情,希望尽快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在干部群众中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全社会进行破除封建迷信的科学宣传活动,等等。应该肯定,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利用行政的力量,从主观愿望出发所进行的种种“文化革命”,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采取全盘否定和全面打倒的态度,其结果是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破坏。但这一时期也不是一团漆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文化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关于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观点等,对我们今天文化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其反面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改革之初至党的十六大,第二个阶段即党的“十六大”之后。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党主要通过阐述“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到表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这一阶段,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对于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根本方针、具体举措等都作了全面的论证。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概念,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关系,对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了专门的论述和具体的部署,特别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

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文化改革

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把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对文化建设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当代条件下,文化不仅对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它本身就是生产力即“文化生产力”,“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其二,“十六大”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提出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其三,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思想,并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其四,“十七大”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表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深刻。其五,十七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且对如何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了全面部署,集中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新时期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时代命题。

通过对我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客观知识的世界”和“主观心理的世界”的总和,和“物质世界”一样,也有它的客观性,不是主观人为地能够加以改变的。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只能是也必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才是一条根本的文化繁荣和复兴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固定模式。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是现成的,而是遵循历史和

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按照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不断开辟和创建出来的。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文化发展的规律不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它本质上就是人的文化创造规律。文化规律的运行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片面夸大人的选择性,把文化发展看成是人的主观设计的产物的观点,是主观唯意志论;而把文化创造简单地看成一个离开人而自发演进的过程,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则是机械主义的宿命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它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我们之所以常常犯割裂历史文化传统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到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虽然离不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种规律并不是机械的,它是建立在人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基础上的,通过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实现的。

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基本走向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是不变的,但在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却是多样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关键。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基本趋向的一致性和路径选择的多样性的统一。任何规律包括文化规律并不是一个命定的线性运行过程,而只是指明了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的趋势和方向,但通往这一基本趋势和方向的可供选择的路径却是多种多样的。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就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基本趋向的一致性和路径选择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同形态文化之间在日益频繁交往中,其共识性和统一性的东西也日益增多。它们之间并不是一方克服一方的关系,而是在“和而不同”中一同向前演进的。中国正处于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样化的局面,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多变化趋势不断加深。与此相适应,文化作为人类生活原貌的浓缩,是抽象化的人类生活,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客观上要求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也会在客观上产生不同的文化形式;而且,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还会产生新的文化形式。这就导致了文化多样化的必然结果。纵观中国当前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文化样式异彩纷呈,多样的文化画面和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正统文化、先进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时尚文化、另类文化、地域文化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多样性的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体现了人们多样化的观念和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文化样态并不是绝对冲突和互相抵触的,它们内在品性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一性,是多样化基础上的统一,排除了多样化就是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或利益群体在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不尊重,也就无所谓统一性。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化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文化的统一性,它们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必不可少。促进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发

展,不仅是人类文化良性成长的自身要求,也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通过其民族性和世界性而具体表现出来的,民族的必然是多样的,而世界的即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存在于民族的多样性之中,而民族的多样性又包含着世界的统一性。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绝不是要固守民族性,也不是全盘“西方化”,而是要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多民族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创造、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新形态,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离开了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和积累,也就没有了文化的“认同依据”和“中国特色”,正如江泽民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存之根,它赋予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以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并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昌盛。胡锦涛曾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的,也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所独创的不朽文化精神,离不开对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又绝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保守的和排除了一切外来文化的,相反它是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文化发展的全球化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曾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

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马克思这里的“文学”实质上就是指“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或文化的世界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和共同趋势。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和对话,一方面形成维护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促进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修正、丰富、完善与发展。最后,文化的世界性并不是文化的“西方化”。虽然在文化的跨民族交往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落差还存在,但随着众多亚文化群体的增多和新的文化平等对话机制的形成,西方单一文化中心地位正被逐渐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西方化”只是一场梦境而已。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光明日报, 2011-10-26.
- [2] 刘云山.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 行政管理改革, 2011(12).
- [3] 江泽民. 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A]//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49.
- [4] 胡锦涛. 在广东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A]//论文化建设[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10.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6.

(责任编辑:石泳)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N Mei-q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only right way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consistent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Reflect on Chinese hundreds of year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road, we know that we must choos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road, instead of western pattern and our original one.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not only Chinese culture reform and inevitable trend, but also the general rule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road is the correct road which accords with the people's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Key words: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road; history; reality; rational